

徐明德 著

论明清时期的对外交流与边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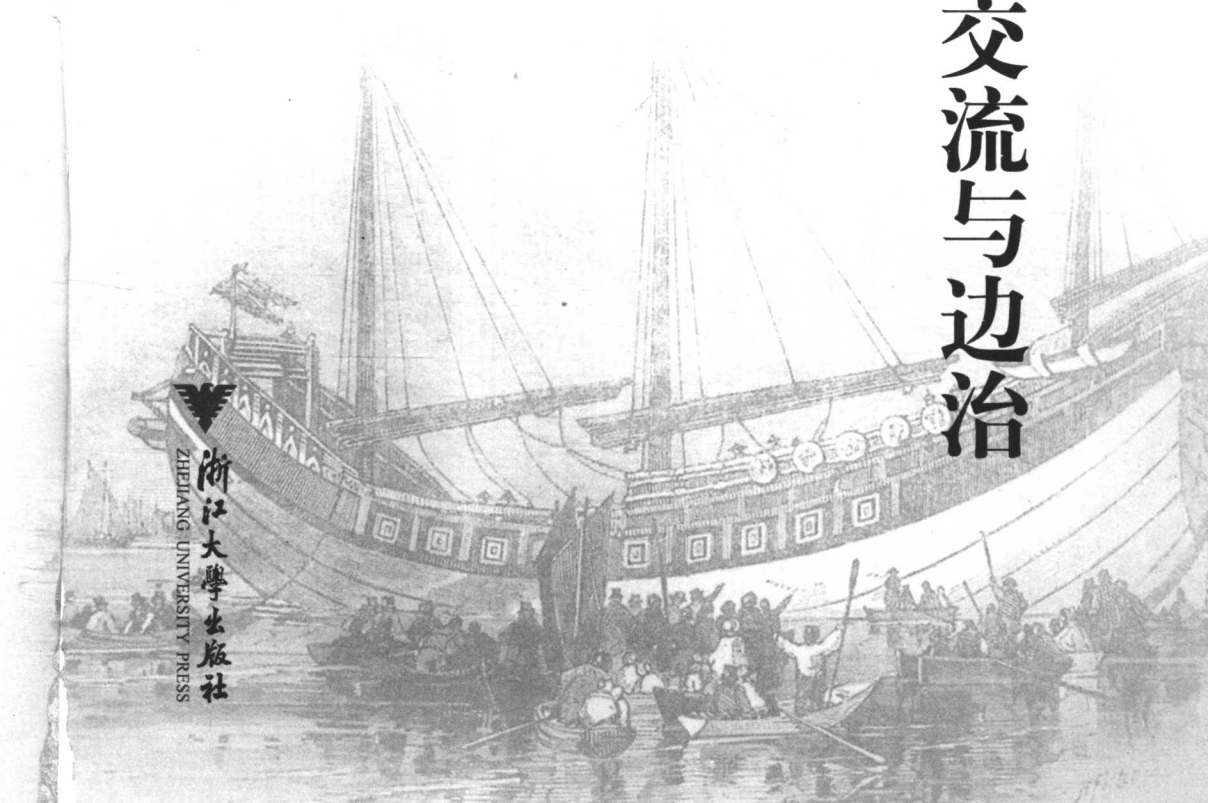
LUN
MINGQING
SHIQI
DE
DUIWAI
JIAOLIU
YU
BIANZHI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徐明德 著

论明清时期的对外交流与边治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明清时期的对外交流与边治 / 徐明德 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7

ISBN 7-308-04826-8

I. 论... II. 徐...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
明清时代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1711 号

论明清时期的对外交流与边治

徐明德 著

责任编辑 陈丽霞 田华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插 页 4

印 张 23

字 数 413 千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书 号 ISBN 7-308-04826-8/D·244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作者简介

徐明德，1935年生于浙江德清，祖籍宁波慈溪。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1953年投笔从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58师文化教员，荣立三等功两次。1960年后，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明清史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的教学与研究，完成学术论著130余种（篇），代表作《清代水师名将王得禄传略与年谱》、《论十三世纪中国民族英雄江万里的崇高历史地位》等，其中10种荣获省市与国家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2种在美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及中国港台地区重要报刊出版。应邀出访过日本京都大学、意大利特兰托大学、罗马耶稣会学院和香港大学、台湾大学等。1977年发起与组织全国10所高校合作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任编写领导小组组长，1979年完稿百万余字，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8月出席香港大学主办的第34届亚洲及北美洲研究国际学术研究会，被聘为“明清时期海外贸易与活动”专题组研讨会主席。兼任杭州胡雪岩研究会副会长与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等。曾负责过教研室工作，也曾一度主持过系的工作。



作者在香港 (2003.12.17)



杭州大学历史系 86 届毕业生师生合影，前排左起徐明德、戴成钧(2-3)、金普森、徐规、沈炼之、黎子耀、胡玉堂、王正平、倪士毅(6-12)(1986.6.18)



浙江省史学会暨温州市史学会代表合影
(2000.11)



胡雪岩研究会成立大会代表留影
(2002.1.20)



在临安马啸乡考察“浙皖古道”时，
作者与夫人合影于石长城
(2001年冬天)



作者在台湾“王得禄传学术讨论会”上
(1994.7.10)



作者在广东南澳港作学术报告
(1994.8.20)



作者在台湾嘉义王得禄将军墓前留影
(199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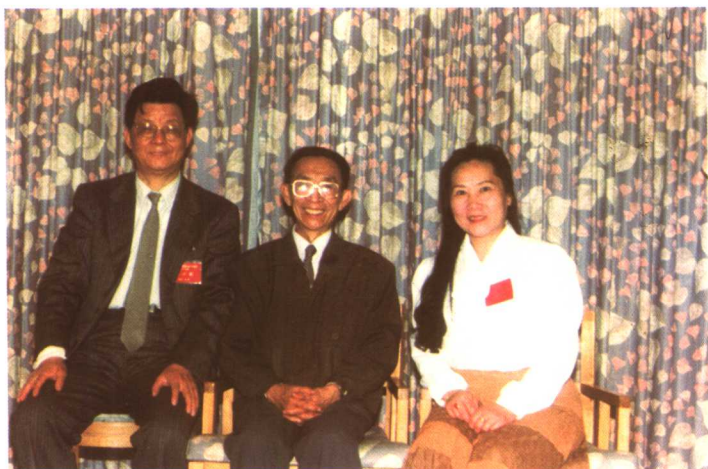
作者在江苏太仓“郑和与海洋学术研讨会”时
与海军中将张序三同志合影 (1996.9)





作者在台北市与陈立夫先生、方文通同学合影
(1994.7)

福州“纪念林则徐诞辰21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作者与林氏五代裔孙凌青大使（原名林墨卿，中国第三任驻联合国大使）、六代孙女林岷教授合影
(1995.6)



杭州于谦学术研究会合影，左起：陈学文、汤纲、来可泓、阎崇年、徐明德
(2003.1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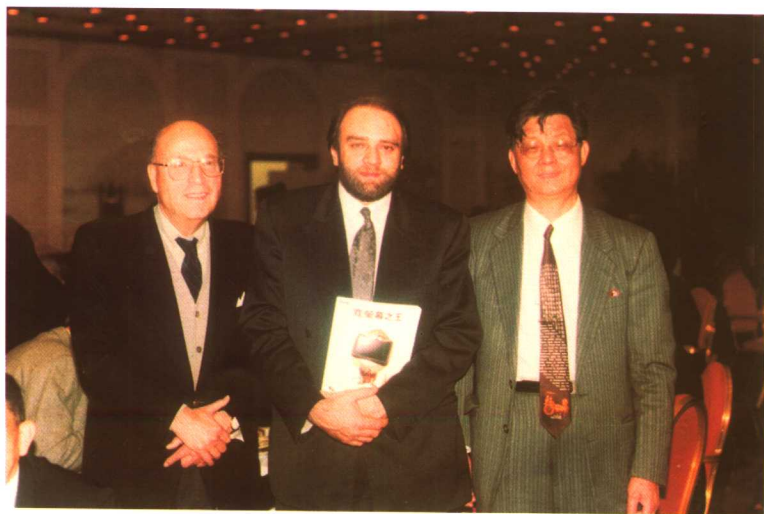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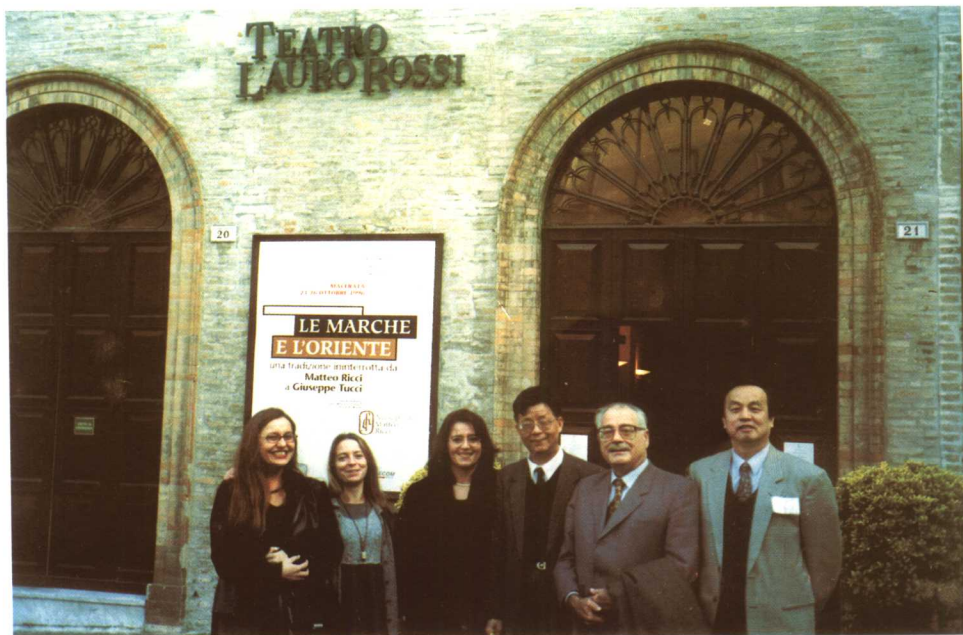
作者出访日本京都大学，与小野和子、滨岛敦俊、夫马进三教授留影
(1991.7)



作者和日本学者山根幸夫、森正夫、川胜守考察明朝中都凤阳城西门
(1995.8.15)

作者飞意大利特兰托市参加国际会议，与市长（中）、会议筹委会主席合影
(1995.12.25)





作者与彼得罗·可拉蒂尼（罗马大学教授，右2）、吕同六教授（右1）、翻译乐靥妍（左1）、安东尼·考拉（左2）等合影于意大利共和国利玛窦故乡——马切拉塔市（1996.10）



天津明清史国际会议时合影，自左至右：郑克晟、寺田隆信、傅同钦、徐明德（1980.8）



赴北京参加国际会议时与杭大历史系82届在京同学留影，自左至右，前排：修晓波、王红、徐明德、林岷、胡哲锋；后排：谢杭生、黄朴民、胡伟（1993.5）

作者由来自卫匡国故乡的斐林丰神父陪同参观其任职的香港慈幼学校
(2003.12.18)



澳门回归前夕，作者和上海东方电视台记者考察明代双屿港国际走私贸易市场遗址
(1999.12.18)

作者与香港大学明清史专家马楚坚博士合影与香港总督府旁的清代炮台遗址
(1994.8)





作者与胡雪岩曾孙
胡文莹先生合影
(2004.2.29)



作者带领杭州大学
历史系(93届)本
科学生考察乍浦
港,发现慈禧太后
出生于平湖县乍浦
满洲旗下营
(1992.10)



赴粤西江村考察古
砖城时合影
自左至右:李楚
权、江梓荣、徐明
德、吴炳锡、江裕
英(2002.7)

金普森教授序

我与徐明德教授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留校任教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明德留校后,从事中国古代史、明清史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的教学与研究。他是一位勤奋好学、笔耕不辍的学者。在半个世纪的学习、教学与交往中,我读过他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著作。最近,他从四十余年内所写的文稿中精选了部分,编为一集。他将章节目录、自序和部分文稿送到寓所。承作者不弃,嘱我写序。我与明德既有同窗之情,又有共事之谊,鉴于他矢志不渝,致力教学与学术研究的精神,就写一点读后感及我所知道的事以作序。

徐明德教授这部以《论明清时期对外交流与边治》为书名的专著,仅收论文二十五篇,但是字数已相当可观,因为每篇(节)短则万字,长的达三万余字。所选收的文稿分为五章二十五节。第一章“国策”,论明清时期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第二章“以人物为中心,反映对外交流与边治”,分十节,选择朱元璋、郑和、于谦、宋应昌、张居正、张煌言、郑成功、王得禄、林则徐、胡雪岩等十位历史人物,以他们的事功,来阐述明清时期对外交流与边疆治理中的历史作用。第三章“从港口建设和海外贸易,看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分七节,从浙江的宁波港、双屿港、乍浦港以及闽粤南澳港等进出口贸易,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第四章“西方耶稣会士的来华,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分四节,选择了依纳爵·罗耀拉、利玛窦、艾儒略、金尼阁、卫匡国等西方耶稣会士的来华活动,剖析了他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第五章“附录:怎样评价历史人物”,分三节,选择王得禄、王直、胡雪岩为例,以座谈讨论、通讯交流、调查考证等形式展开。这是作者四十多年治史成果的精华,也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

《论明清时期对外交流与边治》一书的最大特点,在于作者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非但有知,而且有识。20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历史学界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争论,不仅是学术争论,而且是一场政治斗争。1970 年 10 月 27 日《文汇报》刊载了《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一文,断言“让步政策是套在农民头上的新枷锁”。徐明德从此时开始研究让步政策问题,并以朱元璋与明初的让步政策作为个案,撰写了《试论朱元璋的让步政策》一文,论述了明初让步政策的历史作用在于:缓和了阶级矛盾,造就了一个安

定统一的局面,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促使商业繁荣,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创造了条件。进一步阐明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是构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生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一定时期内的主要动力,但绝不是始终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统治阶级的改良和改革措施,也是在阶级社会中某个特定时期内起了动力作用的。因为阶级斗争解放了生产力,一切改良和改革措施,或者说让步政策,是起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这较之单从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为历史发展动力的视角开阔得多。历史是划了句号的过去,但是对历史为对象的史学研究还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认识。

对倭寇和王直的评价问题,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徐明德教授以对明清时期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研究为突破口,认为闭关锁国政策颠倒了历史上的是非观,制造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历史上某些被定为“海盗”、“倭寇”的人,并非真正的海盗或倭寇,王直就是一个典型人物。王直是中国明代的历史人物,他被当时的明王朝定做“海盗”、“倭寇”,后人按着明王朝的口径对王直谩骂了数百年。明德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得出的结论是:“王直是我国 16 世纪的重要历史人物,他的活动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进。有人把他打成‘民族罪人’、‘倭寇头目’,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今天只有以对待闭关锁国政策的态度,结合 16 世纪的经济形势来进行衡量,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这样,即使王直称不上 16 世纪反对封建闭关锁国政策的英雄,至少也称得上我国 16 世纪进步势力的代表。他的历史地位和农民起义领袖们不分上下,应该给予肯定。”

应该说“倭寇”问题很复杂,明代有真倭与假倭的问题,真倭是骚扰中国沿海、烧杀抢掠的日本强盗,而多数又是反海禁的在海上武装走私的中国商人。王直是徽州商人,为了冲破海禁政策,与明朝官方冲突,被称为“倭寇”。当我们认识到明清闭关锁国政策的危害,就应对反海禁商人与真正的海盗加以区别,重新评论这些商人。明德在这一点上走在学人的前头,是值得赞扬的。徐明德教授治史利用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道路,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卫匡国是意大利特兰托人,1643 年 7 月来中国传教,1661 年 6 月死于杭州。他是欧洲杰出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与著名的汉学家。他用拉丁文撰写了《中国历史十卷》、《鞑靼战纪》、《中国新地图集》等中国史地学术专著,为使欧洲和西方国家认识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明德广采历史文献资料,撰写了《论意籍汉学家卫匡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卓越贡献》等学术文章外,还搜集卫匡国死于杭州的资料,寻找卫匡国墓地。他在杭州市西郊找到卫匡国墓地及墓志铭,不仅深化研究,还促进中意两国的友好关系。对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研究,也是从史

籍、方志及有关资料研究的同时,进行了社会调查研究。如关于胡雪岩的籍贯,《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刊载《胡光墉籍贯考辨》一文的结论是杭州人,文物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胡雪岩故居》一书也说胡雪岩是杭州人。明德除查找有关资料外,还亲自到浙皖古道沿线采集口碑资料和考察古迹。他考察了临安马啸乡浙皖交界的浙川溪上胡雪岩当年出资重修的一座石拱桥。他认为胡雪岩出生于安徽省绩溪县十都胡里村,十二岁由亲戚推荐,经浙皖古道到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此后在王有龄、何桂清、左宗棠等提携下,成为清代最著名的“红顶商人”。在杭州不但独创“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还在杭州建造了豪华住宅。籍贯实际上是指祖籍而言,胡雪岩的原籍(也是祖籍)是安徽绩溪,寄籍是浙江杭州。因此胡雪岩是安徽的历史名人,也是浙江的历史名人。这个结论是可靠的,也是科学的。在研究王直的“倭寇”问题时,他考察了王直活动地浙江双屿港国际走私贸易市场遗址。在研究清代乍浦国际贸易港时,他多次亲赴杭州湾北岸进行实地考察,不仅参观旧址,而且获得不少感性知识。他还发现慈禧太后出生于乍浦满洲旗下营,指导学生撰文《慈禧太后出生于乍浦》在《浙江日报》上(1993.1.9)发表,受到新华社的肯定和称赞(《解放日报》1993.8.23)。一位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人,能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考察、调查,其用力之勤,收获之丰十分值得称道。

在明清史研究的学术著作之林中,《论明清时期对外交流与边疆治理》一书,具有自身的特色。它的出版,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其很强的现实意义。明德年近古稀,在学术探索上,还是刻苦学习,笔耕不辍,我祝愿他健康长寿,希望他在史学研究上继续努力,不断奉献给大家更精美的著作,为繁荣我国的社会科学作出新的贡献。

金普森

2005年重阳节于杭州颐景园寓所

(金普森,男,1932年10月生,浙江义乌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通史》主编,原任杭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系主任、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职)

何龄修教授序

浙江大学徐明德教授将其有关明清对外交流和边疆治理的书稿编排、整理,准备出版。感承不弃,遥征小序。拜读徐教授的书稿,深感他做了很好的工作,书稿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令人钦佩。

应该说,本书是徐明德教授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大半生的小结,一座个人的学术丰碑。据他《自序》说,这是从他四十多年来的大量著作中选辑的精华和一生心血的结晶。这就说明,他经营此书是严格、郑重的。我只质疑其中的“一生”二字。他虽然年届古稀,但健康状况良好,学术上成熟,定能续写辉煌,则此书无疑具有他的学术生涯中里程碑的意义。

明清史研究在近三十年来有明显的发展,连对外交流、边疆治理这样一类涉外课题,也逐渐成为热门。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甚至成立了颇具规模的边疆研究中心,可见这类课题已得到广泛的重视。明清的涉外问题,与前代有很大的不同,明清以前各代基本上是与亚洲近邻各国发生交流和纷争,自海洋远程航路开通以后,接踵而至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活动扩展和殖民主义势力东来,改变了明清对外交流的格局和内容,边疆治理也面对新的复杂局面和严重压力。自明代肇其端,到清代逐渐被完全卷入世界资本殖民主义体系,明清国家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毫无疑问,加强这方面历史的研究,在科学上具有重要和迫切的意义。本书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涉外领域的史学著作中,本书具有明显的特色。作者既重视对全局性问题的研究,又在放眼全局时偏重这一领域中的乡里(浙江)人物和状况的研究。其中乡里人物有于谦、宋应昌、许都、张煌言、胡雪岩(胡雪岩虽非浙江人,但长期在浙江活动)等,都成为他的研究重点。对外贸易则除南澳外完全以浙江宁波、双屿、乍浦和杭嘉湖地区为论述范围。研究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也有类似的情形,既有全面的整体的论述,又以多在江浙活动的艾儒略、金尼阁、卫匡国为典型做深入钻研。这是很高明的,可以减少同行研究撞车的可能性,而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也有利于对相关历史问题的调查和理解,也许还有乡邦文献可供利用。这表现出一个成熟的学者在择题上的机敏的考虑。

本书在内容上也有突出的特点。例如郑和研究,远的不说,百余年来中外

史学都热衷此一课题,著作如林,但都围绕郑和下西洋(和南洋)史事展开。徐明德教授独具慧眼,另辟蹊径,发现郑和下东洋(日本),不止一次,而是三次。郑和下东洋的历史远不如下西洋辉煌,但他七下西洋,三下东洋,才恢复了其历史的完整性。这是拾补阙遗、彰发幽潜的工作。百余年间国内没有一位专家、学者发现这段长埋的历史,足证没有力透纸背的识见,再加上专心致志的钻研,专注于攻克这一学术难关,绝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我没有研究过郑和,现在病躯也无力复检本书引用的史料,并且不认为徐教授这一工作无懈可击,但仅据书稿,我就感觉所引据的记载,以及作者在记载与记载间建立的联系,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因而支持徐教授的发现。又如白头军研究,也是明清史学同行津津乐道的一个课题。就我所知,只有本书提供了一篇较详尽的白头军全史。这篇全史,一开始研究白头军主帅许都的家世,就依据宗谱推翻了传统史籍的错误记载,发挥了乡邦文献的独特效用。全书各部分都挖掘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史事和人物,特别在白头军抗清斗争、支持郑成功抗清复台,涉及评价白头军的重要历史作用方面,显然使江浙的抗清斗争历史更为丰富多彩。本书的其他章节莫不同样显示出作者治史的功力。

学术争论是学术发展过程的常态,也是学术进步必不可少的动力。本书有些章节研究的是极富争议的问题(如郑和出使日本、汪直评价、王得禄和蔡牵评价、资本主义萌芽、传教士作用估计等),在含有徐教授提炼的重大新史实、概括的重要新结论的章节,传统的说法往往像梦魇一样纠缠人的头脑,何况学人本应牢记多闻阙疑之义,作为治学的座右铭,因此争论几乎不可避免。面对争议,我们只有以百倍的努力,寻求更周密更坚实的论证,并且等候时间老人评判,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郑和下东洋碰到激烈的质疑,日本的冈本健一先生甚至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幻想”。冈本先生明显言重了。既然宫崎市定教授已经提及此说,可见郑和下东洋论也是“日本人的幻想”(如果宫崎教授没有举证,则是天才的推论,而按冈本先生的说法,这就尤应是“日本人的幻想”了)。当然,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只能靠冷静、严格的科学研究,不能情绪化。明清史料浩如烟海,我们期盼徐教授继续搜寻进一步的证据。下东洋是一件大事,为什么从事实发生之日起约一百五十年后始见于记载,毕竟需要强有力的解释。徐教授称之为三次秘密出使,了解建文帝踪迹,“使命特殊”,“必须避人耳目,进行暗访隐察,要求中日两国官书和实录都不准记载”。这些话好像就是针对性的解释,但不知有何根据,而且似乎也不是圆满的说法。因为郑和